

孔繁信 / 选注

孔繁信，字声远，山东临沂费县人，
山东大学文学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论、文学史学、
金瓶梅词话研究，著有《金瓶梅词话研究》、
《金瓶梅词话研究》、《金瓶梅词话研究》等。



济南历代名家诗文选

JINAN LIDAI MINGJIA SHI WEN XUAN



济南出版社

杜仁杰诗文选



济南历代名家诗文选

JINANLIDAIMINGJIASHIWENXUAN

- ◎《李清照诗词选》
- ◎《辛弃疾词选》
- ◎《于慎行诗文选》
- ◎《李攀龙诗文选》
- ◎《边贡诗文选》
- ◎《张尔岐诗文选》
- ◎《李开先诗文选》
- ◎《王革诗文选》
- ◎《杜仁杰诗文选》
- ◎《张养浩诗文选》

ISBN 978-7-80710-764-4



9 787807 107644 >

定价：20.00元

I222.7/20

:9

2009

孔繁信 / 选注

济南历代名家诗文选

JINANLIDAIMINGJIASHIWENXUAN

杜仁杰诗文选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杜仁杰诗文选/孔繁信选注.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09.4

(济南历代名家诗文选)

ISBN 978-7-80710-764-4

I. 杜… II. 孔… III. ①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元代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元代
IV. I214.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37398号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经七路251号 (250001)
网 址 www.jnpub.com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45×210 1/32
印 张 5.375
字 数 131千
定 价 20.00元

(济南版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可随时调换)

总 序

李永祥

唐玄宗天宝四年，即公元745年，时年三十岁的杜甫东游齐州（即今济南）。是年春夏之交，他陪同其祖父杜审言的挚友北海太守李邕在济南大明湖历下亭宴请济南士绅。是时，南边的一带青山白云涌起，凉爽的风从湖面碧绿的荷丛中吹来，驱散了亭中的暑热。悠扬的丝竹和歌姬婉转的歌声飘荡在湖面上，良辰、美景，贤主、嘉宾，激发了杜甫的诗兴，他即席赋咏了《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一诗。诗中名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腾誉人口，素为济南人引以为荣，用现今的流行语言说：诗圣杜甫无意间做了济南的形象代言人。

济南是国务院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自上古而至近日，历代名士辈出，灿若繁星，绵延不绝。其中不少名士不仅在他生活的时代业绩卓著，而且沾溉后世、影响深远。济南名士多，确实是济南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最突出的特色。诗圣之语，非虚誉也！历代名士留下了许多著述，这是济南历史文化的瑰宝，是济南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主要载体。整理出版这些文献，是深入研究、弘扬济南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最基本的工作之一，是加强济南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提高济南文化品位的最基本的工作之一。同时它们虽是地方文献，但又是中华文明独具特色的、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故而其对中华文化的整体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长期以来,除少数特别杰出的名家乡贤如李清照、辛弃疾等受到重视并得到充分研究外,多数济南名士的著述堆在旧书库里,无人问津,有些甚至鼠咬虫蠹,残损遗失,令人遗憾。故而抢救、整理这些宝贵文献也是迫切的、刻不容缓的。济南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早就有志于此,当然在目前市场竞争很激烈的情况下,他们做这个工作是面临着不少障碍和困难的。他们基于对家乡文化建设的使命感,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在济南名士著述中精选出十家,并诚邀当代济南文史名家,进行编选校注,奉献给济南人民。应该说从事这类研究和出版是付出多而获得少的,是一种难得的奉献精神,是基于对家乡的热爱。丛书的顺利出版也得力于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对济南文化建设的远见卓识以及具体的关心和支持。这项造福当代、沾溉后人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表现出意义的深远和重大,它也是对即将在济南召开的全运会的重要献礼。

济南出版社这批推出的名家选集是确定了很高的标准和严格的体例要求的。首先是作者的遴选,要求作者必须是省、市知名的文史专家且对选题及济南文化有着深入研究的,力求做到是当代名家选注历史名著。而对作品的精选要求充分体现出作者时代和美学特色,注释在力求准确的基础上,要简明通俗,以适合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理解。还要有对作者生平介绍的资料以及对作者成就价值的综合评介,以帮助读者能从宏观上把握作者的特色,为理解作品奠定基础。这是统一的要求,应该说现已推出的每种选本都达到了这一要求。但基于每个选注的

作者具体情况不同，体例上又有所变通，比如李清照的作品古今注本众多，乃至不可枚数。故而，此种选本不以注疏为重，已故的徐北文先生在每篇诗文之后都附写了简明的品评文字。徐先生不仅对济南二安有深入研究，且他精于古诗词写作，所以他的品评不仅多有创见，发人所未发，而且当行不隔，分析鞭辟入里，是其他同类注本不能取代的。另外，有的著述前人从未进行整理，故以校注为重，同时附录作者年谱或年表帮助读者了解作者，这也是前人没做过的工作，这样，选本也就具备了独有的特色和价值。此外，有的作者的作品能编年的按编年排列，如李攀龙；不能编年的按体裁分类编排；有的作者除诗文之外还选了些词曲名篇，如李开先。总之，各种选本体例不尽相同、有所变通，是为了更好地体现作者的特色，更好地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作品。所以，应该说体例的变通也是丛书的一个特点。

《济南历代名家诗文选》丛书的出版发行是济南历史文化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它将会推动济南历史文化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高度。为此，我向济南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以及丛书的作者们致以热烈的祝贺与衷心的敬意，我殷切地期待着其他济南名士的著作能尽快陆续出版，形成完整的系列，将这项意义重大的济南历史文化的系统工程做得更快、更好、更完美。此可谓：利在当代，功存千秋。是为序。

2009年2月写于樗居

前言

唐末,东北契丹族兴起。到五代时,辽太祖耶律亿把势力扩展到河北、山西、内蒙一带,北宋王朝一直受着辽国的威胁。北宋末,金国的兴起取代了辽国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到太宗完颜晟时,金军竟然长驱直入宋都汴梁,掳走昏庸腐败的徽、钦二帝,这就是史称的“靖康之耻”。之后,金、宋以淮水为界,对峙近百载,蒙古族又兴起漠北。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蒙古军首领铁木真即帝位,称太祖,开始了他进行扩张、统一大元的战争。元太祖九年(1214),蒙古军迫近金京中都(北京),逼使金宣宗完颜珣由中都迁至南京(汴梁),史称“金之南渡”;到元太宗四年(1232),元军又攻陷汴京,金哀宗仓皇出逃河北,这就是史称的“金之北渡”。金军不利,再南渡黄河,走归德,入蔡州。金哀宗在元、宋军的夹击下,于天兴三年(1234)初蔡城被攻破后,自缢死于幽兰轩,至此金亡。著名文学家杜仁杰,便生活于宋、金、元三朝争夺中国大地最激烈的时期。在这金戈铁马的岁月里度过了他惨痛欲绝的一生。

一、杜仁杰生平

杜仁杰(1197?—1282?),字仲梁,号止轩。先名之元,先号善夫(“夫”也作“甫”),晚号散人,济南长清人。其父杜忱,字信卿,姿美行洁,以词赋雄东州,试为益都路魁,登进士,授京兆录事判官,以疾归里,卒于金宣宗贞祐丙子年(1216)。从墓碑还知其高祖文、曾祖实、祖瀚等先人之讳。其子杜元素,字质,曾任福建闽海道廉访使。仁杰卒后,因其子贵赠翰林承旨、资善大夫,溢文穆。论其家世,是个世代官宦之家兼书香门第。

杜仁杰的少年时代,是在一个家境优裕、环境幽美的仕宦家庭中度过的。家有万竹园,园内有“万竹堂”,祖父约为退居小吏,父亲为官京师,自己就生活在这样一个风景优美、琴棋书画的文明之家。自幼良好的家庭教育,祖父对其文学传教和影响,使其在诗、词、曲、文方面植根甚厚。天然安适的生活环境,陶冶着这位天真烂漫的少年,使他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理想和愿望。贞祐初,元太祖成吉思汗率军分三路南征中原大地,杜父以疾退居家野。当元军征伐山东时,其父在“兵乱中行仁布德,全活数万人命”,深受家乡百姓的爱戴。由于蒙古军连年在山东烧杀掳掠,广大人民备受战争劫难之苦,而杜父也在战乱中屡受磨难,并于贞祐四年(1216)含恨而卒世。杜父去世后,这位二十来岁的青年,饱含着悲伤的眼泪,除为父亲庐墓于家乡,便是读书于“万竹堂”侧的小龕屋里,使他青春的心灵中种下对蒙古军暴行不共戴天的仇恨和敌视情绪。

贞祐二年,金宣宗由中都(北京)迁都汴梁,然后又向元军屈辱议和,元军除维持其征服的中原之地,暂时没有灭掉金国,成吉思汗又引主力军挥师西上,开始了他第一次征服西域诸国的战争。而金统治下的中原之地,又暂时恢复了苟延残喘的局面,呈现出一时安定的世态。金廷于正大元年再次开科取士,收揽人才。这时,二十七八岁的杜仁杰,正想施展他青春的抱负和理想,便于正大元年(1224)春离开家乡,南游汴梁。这年他可能参加了金廷的科考而未中,正大二年仍留京师,伺机干禄求官,但均未达目的。在这里,他结识了大诗人元好问。后杜仁杰又西游郑、洛,于正大四年(1227),同友人张澄、麻革等同去内乡,往依内乡令元好问。在内乡山中隐居期间,他们日以作诗为业,互相切磋技艺,互相评论诗作,使诗歌创作大有长进。杜氏之诗也由青年理想的稚气,向着老练稳健发展,往时的“丝竹”之叹幻灭,转向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探求,这应该说是他文学创作向着成熟飞跃的阶段。正大七年(1230),他离开内乡,东游陈、蔡、许、颖,后又旋入汴京,等待求官

机遇。正大八年(1231),元军分南、西两路包剿汴京,此时杜仁杰随军出逃。开兴元年(1232,亦即天兴元年),拖雷军与金军战于钧州三峰山,金军大败,杜氏在乱军中于延津北渡黄河,逃归故乡长清,结束了他这次长达八年之久的游历生活。那种本想“万里长鸿思一举”的理想,结果成了枪林箭雨中惶恐奔命的流徙,对这位曾想施展抱负、想做番济世拯民事业的读书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他那壮志凌云的年华,就是这样随着元、金、宋三方的争战而被吞噬和消磨掉了。杜氏回到家乡后,随着金国的灭亡,那种失落的悲痛,那种颓废的情绪,以及对元军暴行的逆反心理日益加重,所以他慨叹道:“时不与道,命不与志”,“河南走亡于故居,泪堂而悲”。正在他悲伤沉闷之际,严实“称藩于东平,以长清为汤沐邑”,“能折节下士”,请名流学者延教其子,开办庙学。杜仁杰和一批名人聚集于长清。而杜氏还成为严门的食客和顾问,成为严氏治理东平的谋划者,这为后来严实及其子弟治理东平打下了良好基础。

杜仁杰的中年时期是在东平严氏幕府中度过的。当严实卒后,其子严忠济、严忠嗣、严忠范相继为东平行台。这段时间约从乃马真后称制到至元初的二十多年间。此时,正是元军几次远征欧亚大陆和渡江攻灭南宋的时期。元军对被征服的区域,仍用粗暴的统治手段,变耕田为牧场,掠夺百姓为牧奴或手工业奴隶,这就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和反抗。而严氏父子称藩的东平,则集中了一大批金亡后的名流人物,像王磐、王鹗、商正叔、商挺、宋子贞、李冶、李昶、刘肃等,他们为治理东平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严氏父子在门客顾问杜仁杰的积极建议下,办了三件深得民心的事。第一,宣扬孔孟仁慈爱民的王道,以反对野蛮劫掠的霸道,以德教民,以礼养士,深得东平民心。杜氏建议严实把“善善堂”改名为“种德堂”,以教严氏子孙和辖区内的百姓行善修德,这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和重大社会意义的。第二,杜氏积极建议严氏父子兴学

养士。作为以杀伐为耕织的元统治者，是不会理解东平严氏兴学养士的重大意义的。然而东平率先办起了东平府学，不仅吸引了大批名流学者会聚于此，对东平严氏政权建设和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还为元廷培养出一大批政治人才和文化人物，这在元史里有较多的记载。像前边提到的二商、二王、二李、宋、刘等，都当了元廷的高官；后起之秀的王构、李谦、徐世隆、王旭、孟祺、阎复、高文秀、张时起等，也成为元朝的官员和文化名人。正如《严忠济本传》里所说：“东平庙学（即府学）……教养诸生，后多显者。”第三，兴礼乐以化民，改变杀伐之音。金亡后，严氏首先把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从汴京请至东平，进行礼乐之教，并为元廷输送了大批的礼乐人才。严氏父子治理东平的四十多年间，曾数次去曲阜拜孔祭孔，意在宣扬孔孟的仁义礼乐之教，反对元廷的野蛮政治，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把东平治理成为一块“王道乐土”，这与杜氏的积极建议和亲自参与是分不开的。总之，杜氏在东平时期，不仅自己去府学执教讲学，还写了不少诗文曲词，为东平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到至元初，杜仁杰已是六十五岁左右的长者了。而东平行台严氏兄弟相继衰落，退民家野，杜氏所依重的靠山不复存在；再加之统末、至元初行政区划的变动，东平散府，新任执政者对其态度不像严氏兄弟那样亲密无间。另外，东平时期（指1232年严实治东平至1264年忽必烈改称至元）的患难老友相继离去，或入京做官，或去各地任职。至元初，元廷又命王鹗、李冶、徐世隆、高鸣、胡祇通、周砥等入京编辑辽金史。这些入京做官的老友，并没忘记杜氏这位满腹经纶的故知，屡次向皇帝推荐这位“德行文章冠冕南北”的人物。而“元世祖闻其贤，与大臣议，以翰林承旨授公”。可是杜氏却无动于衷，“累征不就”，婉言谢绝，对于入朝做官抱着冷漠态度。究其不出官的原因，恐怕有以下几点：一是他亲身经历过金元战争，看到元军及其统治者的惨无人道，不愿与之同流合污；

二是他有深厚的儒家正统观念,出身于仕宦之家,蒙受过金之恩惠,不愿叛主;三是元军征掠山东,其家身受其害,其父在战乱中死去,恐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他晚年情愿去做“江湖散人”,也不愿入朝为元廷之官。因此,约于至元二年(1265)后,他便毅然离开东平,“乃优游于灵岩、五峰两名胜而终焉”。

在晚年的十七八个春秋里,他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隐者,也是一位不穿道服的道士、不披袈裟的僧人。其行迹遍及泰山、灵岩、五峰、长清、济南,成为一位热心于慈善事业、笃信佛道、施德行善的散人,总想为解救苦难中的众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期间,他曾写过两篇《募疏》,这与当时的杀伐政治和残暴掳掠的元朝统治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泰安阜上张氏先莹碑》里,歌颂了张志伟修道精诚和建设泰山道教文化的功绩;在洞真观主《王氏葬亲记》里,对王真隐开辟五峰山道场的贡献,给予了热情赞扬;在《真静崔先生传碑》里,记述了崔道演乱世中行善救民、南北施教的纯诚之志。杜氏虽晚年退隐山林,但有时出游外地,或故地重游,或拜会友人,或游览胜景等。有据可查的有两次:一是宪宗四年(1254),他重游金故京汴梁,凭吊金之兴亡之地,缅怀往昔之旧,感叹亡国之悲,而后又去杞县拜会故友郝经;二是约于至元八年到至元十一年间,他曾去故萧地长垣县游历,为写《崇真观碑》和《仲子祠堂碑》,他由此去河南郑、洛,然后入华岳、长安等地远游。归后到去世前,曾写了《娄敬洞洞虚观碑》和《故宣差千户保靖军节度使李侯神道碑》。通过这些文章歌颂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高尚情操,亦是作者对自己一生行为和情操的珍爱。

二、杜仁杰的文学创作

杜仁杰的一生,是在宋、金、元互相征伐的战乱中度过的,那种戎马倥偬、山河破碎、时代荒乱的烙印,在其文学创作中都有着鲜明的写照。杜氏虽一生没做过官,但其文名相当卓著。他是当时

诗、词、曲、赋的文学大家，但因时代的纷扰、战乱的袭荡，作品已大量流失，留下来的作品仅是其创作的风毛麟角，但仍能管窥其作品的主要内容和艺术风格。就其作品的主要思想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可以“北渡”后的“东平时期”为限，“北渡”（1232）之前，是他青壮年时代的作品（为前期之作）；“北渡”后和“东平时期”（1232—1265），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离开东平之后（约于至元二年，1265年），隐居而终，是他晚年时期的作品。这三个创作阶段，可以看成三个创作时期。虽每个时期留下的诗、词、曲、文屈指可数，但细细品味起来，不论是作品内容和艺术风格，都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和醒人耳目的艺术特色。他之所以能在当时蜚声文坛，而后人又对其文学创作评价甚高，主要因为他的文学作品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下按其文学体裁分别加以论述：

（一）杜仁杰的诗。他一生写了多少诗，亡逸了多少？今不得而知。胡紫山说他“百年放适诗千首”，王恽说他“细吟风雅三千首”，虽然都是夸张之词，不是实写，但知元遗山曾给杜氏写过《逃空丝竹集引》，这是他青壮年时代的诗集，当时可能刊行流传，但今已不复留存。后人对他的诗歌评价也不少，说他“牧之风调”、“樊川气格”，元遗山评其诗说：“气锐而笔健”等等。就留下来的三十来首诗看，其早年诗作有“小杜”之风，中年之作似有“老杜”气格，其中写金元战争的诗篇最具备这种特色。像“吴疆连晋境，汉卒杂番兵”，“老泪河源竭，忧端太华齐”，皆战争之叹也，似“老杜”《悲征》、《羌村》之哀矣。当宋元战争再起之时，他痛苦地写道：“此去乱离何日定？”“故里山河涕泪边”，那种亡国之恨、百姓涂炭的心情，犹屈原去国之悲、庾信《哀江南》之叹矣。他回到故乡后，直到金亡，诗作里表现了极度焦躁苦闷的情绪，那种“自发醺鸡覆，蓬心得少瘳”的烦恼，漫无目的而又无处遣发。当金亡后，他对自己前途命运的希望就更加渺茫，那种“避世相看老”、“何地不菟裘”，宁愿老死家乡，也不愿为元统治者供事的意志异常坚定，都表现了他

那种“器业霞高，志行高峻”的人格和情操。到了晚年，他避居山林，追求大自然的山水之美，沉浸于烟霞云雾之中，那种陶然自乐、唯其天趣的心情，使之诗歌呈现出飘逸之致；那种“泉鸣灌木杪，人语飞鸟上”，“明日黄尘中，回头失昆阆”的诗句，追慕着人生之乐的心情，跃然诗绪之外。从杜氏所留诗歌的内容观察，他在不同的时期，生活思想、心情皆与其诗作所表现的内容感情是协调的同步曲。

（二）杜氏的词和曲。词曲在金元时期是一个巨变的阶段，由唱词慢慢发展成唱曲，即由词体逐渐向曲体过渡。而杜氏的文学创作正处于这种文学体裁演变的过程中，又因其父是词赋名家，从小受到词曲方面的良好教育，所以他的词曲写得都很出色，以“谐谑”而著称于世。如果从后世学者对其文学成就评论看，对其词曲的论定却比诗文评价高。就其所留作品而言，数量确实不多（现存词二阙、曲六篇。其中残套二篇，南北合套一篇，疑非其作）。但其所写内容题材相当适时重要，词曲风格也鲜明，均为婉约清丽之

1. 东平杂剧在中统(1260—1264)前后已经在民间大演,但其名称和体制尚未确定,只以“么末”呼之。2. 金院本还未淘汰,仍与杂剧同台演出。3. 东平杂剧形成较早,北渡后便在东平逐渐兴盛,中统前后已很普通。4. 勾栏的建造形式以及观众看戏的方法方式与演出方法等,已基本确定。5. 由此可以推定东平为杂剧早兴之地,这是元代东平文化发达的重要标志。他的另一套《〔般涉调〕耍孩儿·喻情》是写民间世俗生活的,特别反映了宋元城市兴起,商业、手工业发达后的市民生活。曲中写了男女相爱到相弃的纠葛之事。这里虽写的是市民生活,但反映了那一历史时代世俗生活的特点。全套八支曲子,均写女主人被遗弃后的内心痛苦、后悔、懊恼、发泄和诅咒之情。描写真实生动,心理揭示得透彻入微,痛斥男性朝三暮四、玩弄女性的恶劣品质,这在元代更有其世俗社会的典型意义。还有一套《〔商调〕集贤宾·七夕》,为南北合套,疑非杜氏之作,似为后人误收。据钟嗣成所记,南北合套当在元后期兴于南方,元初北方曲家不可能作“南北合套”。从该曲的语言典重文雅之气,亦不似杜曲之风格。总之,杜氏之曲通俗流畅、明快大方,戏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是其他曲家所难以比拟的。

(三) 杜氏之文。杜氏不仅以诗、词、曲闻名于世,而且也是擅为文章的名家,其记、传、碑、铭、序、跋亦很著称。他每到一处,公私之文,远近来请者很多。王恽在《玉堂佳话》里,曾记述了一段请杜氏为文的趣闻:“李翰林叔能,一日与杜仲梁在茶肆中,有司召公甚急。公曰:‘无他,多是要撰文字,渠留此勿去,少当即来。’”由此可知其文名之广。当时他所撰各体之文定会不少,可惜留下来的只有十余篇。在这些散文中,游记、书传、碑铭、序跋均有。元遗山评其诗说:“仲梁气锐而笔健,业专而心精”,这话用以评其文最为恰当。他所留传记散文较多,有《真静崔先生传》、《故宣差千户保靖军节度使李侯神道碑》(以下简称《李侯神道碑》)、《泰安阜上张氏先莹碑》、《河内公祠堂记》(即《仲子祠堂碑》),又以《李侯神道

碑》最有人物传记文的特点。这篇传记文写于作者八十高龄之际（至元十六年，1279），文内生动地记叙了李侯少有异行，乱世中起于垄亩，在严武惠公麾下为将的成长过程。他那军纪严明、置生死于度外、见义勇为的品质，不愧为一位有胆识有谋略的将军；及罢兵为政，那种宽以待民、严律属下、不贪不贿、为民除害的精神，使得一境皆安，受到百姓的爱戴，不愧为廉洁为民的地方官；及老退居，节俭持家，以孝悌教子孙，不傲视乡里，不愧为平民乡老的典范。其传写来真实动人，评论人物不贬不扬，恰如其分。他在《泰安阜上张氏先莹碑》里，赞扬了张志伟矢志学道成功，得到朝廷褒扬，并为泰山寺观文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他在《河内公祠堂记》里，歌颂了子路治蒲之功和不甘受辱而死的气节；在《真静崔先生传》里，对道家人物那种行医救民、不忌私仇、南北行道的高尚情操大加赞颂。这在长期战乱、民不聊生的时代，是具有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的。

他的序跋文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通俗的语言，恰当地评价文

《泰山碑》，是一篇独具一格的游记散文。它写阴雨之秋登山的艰难，又写至山顶夕景之奇异，那“望之，天光凝碧如紺珠。薄幕至绝顶，由东以望，见山影黯黑，偃卧无际”，仅仅数语，把雨晴后的泰山夕阳奇景，由明及暗，由近及远，勾勒出一幅迷人的天宇山川图。对泰山雨后夕景的描写，在众多的泰山游记中还不多见。再如对泰山观日出的描写，更有独到之处。“登日观峰，六合褰开，肃然无纤滓。待蒸黍时，东方晓晓，乍离乍合。移晷，日露其半，恍然如入无量金色界中。凡在行者，莫不叹诧”。此真乃点睛之笔，把日出一刹那间之景，与观日出者惊奇之情融为一体，真乃物与神会、景与情通，达到景情交融的地步。

他的碑铭之文留下的较多，写得较好的有《泰山天门铭》《谷山寺碑》《娄敬洞洞虚观碑记》等。作者的《泰山天门铭》，意在指摘时弊，揭露社会动乱、争夺王位、改朝换代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和痛苦。在《谷山寺碑》里，表扬了一位不畏艰难创业建寺的小和尚维谨的奇行，指出了社会动乱使寺院荒废的事实，明显地指责了元军烧杀劫掠的暴行。在《娄敬洞洞虚观碑记》里，作者对几代孜孜不倦开辟山场、创建寺观文化的道徒的赞扬，同时也是对鼎革战争带来时代荒乱的斥责。总之，杜氏之文不论写人、描景、述事，都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和现实性，这一点应该说是杜氏散文的独到之处。其他散文就不一一论及了。

三、杜氏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

杜仁杰处于俗文学飞跃发展的时代，因此他的诗、文、曲、词无不带上这一时代的特点。就其文学创作的艺术成就而言，杜氏在后世人们的心目中以词、曲最负盛名。就其词、曲风格而言，均属婉约清丽一派。词风学李易安，好以俗为雅，词的构思新奇，结构精巧，语言雅洁，清丽多姿。《朝中措》一阙写得最有特色：

汴梁三月正繁华，行路见双娃。遍体一身明镜，遮尘满面